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68

汤显祖

李真瑜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06
68



引 言

十六世纪的中国正值明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时期,尽管社会政治腐败如故,但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思想文化领域开始涌动着一股具有封建民主主义色彩的新潮流。这一新潮流在思想上的代表是李贽,而在文学上最杰出的代表,则是戏剧家汤显祖和他的剧作《玉茗堂四梦》。

一、坎坷宦途 遗爱人间

——汤显祖的生平

(一)求仕时期

汤显祖，字义仍，或作义少、义父、义叔，号海若、海若士（一称若士），晚年号茧翁，别署清远道人。所居名玉茗堂、清远楼。江西临川人。

临川，三国吴太平二年（257）分豫章郡置。治所在南城（今县东南），辖境相当今江西抚州市以南的盱江及宜黄黄水流域，西至乐安县境。西晋时移治临汝（今抚州市西）。明时置县。这里山川毓秀，地灵人杰，在汤显祖之前五百年曾出过一位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人物，此人就是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的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1021—1086）。物换星移，花开花落，又过了五百年，当时间老人走到明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公元1550年9月24日）这一天，一代文学巨匠汤显祖也在这里诞生了。这是个值得后人永远纪念的日子。

汤家宅居位于临川县东门外文昌桥东汤家山，那里的景物环境在汤显祖心中是极美好的，后来他在所作《吾庐》一诗这样描述说：

文昌通旧观，东井映余辉。
出入桥梁望，郁葱佳气微。
层台对金玉，隈阡隐灵芝。

如今文昌桥仍横跨于抚河之上，而汤家祖居及其周围的环境距诗中的描述已相去甚远了。

在临川，汤家是颇有名望的书香世家。藏书数万册，并有汤家私塾。汤显祖的祖父懋昭，字日新，号西塘，有文名，笃信老庄之学。父亲尚贤，字彦父，号承塘，崇尚儒学，“为文高古，举行端方”（《文昌汤氏宗谱·王志〈承塘公传〉》）。祖父和父亲在思想上的不同意趣，对汤显祖影响很大，他说：“家君（父亲）恒督我以儒检，大父（祖父）辄要我以仙游。”（《和大父游西魏夫人故址诗序》）即为明证。

汤显祖天性聪慧，再加上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时既显示出卓尔不群的才气，五岁便能属对，现存汤显祖诗文中还有他十二岁时作的《乱后》一诗。汤显祖十三岁时从徐良傅学古文词，朝夕精读《文选》，学使处州何鏞见而异之，说：“文章名世者，必子也。”（汤显祖《负负吟》诗序）又师从罗汝芳，学习修身之道。罗汝芳是泰州学派大师王艮的三传弟子。泰州学派反对程朱理学、注重个性的异



汤显祖画像

端思想,通过他直接灌输到汤显祖的思想中。汤显祖后来说:“一生疏脱,然幼得于明德(汝芳)师。”(《答邹宾川》)

嘉靖四十二年(1563),汤显祖年十四,补县诸生。在学作举子文之外,已能为古文词,所读书除四书五经外,遍及诸史百家。隆庆四年(1570)汤显祖二十一岁,这年秋天他考中江西乡试第八名举人。此时,他于古文词外,“能精乐府歌行五七言诗,诸史百家而外,通天官、地理、医药、卜筮、河籍、墨、兵、神经、怪牒诸书”(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其声名也播于海内,人们以得见其风采为幸。

这时汤显祖还未曾经历过任何人生挫折,弱冠中举,使他觉得仕途之门就要向他打开。他关注国家和百姓的命运,企盼着走上仕途,能为国为民有所作为。他后来在三十七岁时有一首诗曾描述这时的他那种自信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心态:“弱冠精华开,上路风云出。留名佳丽地,希心游侠窟。历落在世事,慷慨趋王术。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三十七》)在汤显祖生活的那个时代,读书人乡试中举后,在科举入仕这条路上冲击的最后一个目标就是进京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会试及第意味着步入仕途。从上面的那首诗看,乡试中举后的汤显祖有些太天真了,他根本不知道临川以外的世界的真实面貌,他更不会想到等待他的是一条坎坷而漫长的路。

隆庆五年(1571),二十二岁的汤显祖首次赴京应春试,不第。三年后即万历二年(1574),他再次入京应试,又名落孙山。落第后的汤显祖没有回临川,而是留在南京国子监读书。这期间,他结识了梅鼎祚(字禹金)、沈懋学等江南才士,彼此饮酒论诗,意气颇为相投。梅鼎祚曾作诗称:“义少我辈人,狂鲜与世偶。博文筭在腹,任达柳生肘。”沈懋学也有诗云:“江城来上客,花雨见新裁。小阁青山莫,孤云白社开。片言清病骨,三舍让雄才。明月中宵共,仙踪破锦苔。”(《同汤义仍夜坐次韵》)汤显祖对比他大一岁的梅鼎祚很倾慕,谓“禹金秋月齐明,春云等润,全工赋笔,善发谈端”(《寄宣城梅禹金并序》)。所以,当梅鼎祚向他提出“文赋可通于时,律多累气”(汤显祖《答费学卿》)时,他便着力写作律诗以提高自己的文学才能。后来他们成为一生的好友,汤显祖在晚年给梅禹金的信中写道:“半百之余,怀抱常恶;每念少壮交情,常在吾兄。”(《寄梅禹金》)契谊之深,溢于言表。二人在文学上也有共同的趣好。梅鼎祚也酷好戏曲,有剧作《昆仑奴》、《玉合记》等传世。汤显祖还专为《玉合记》写了题词,这是万历十四年(1586)的事。

万历五年(1577),汤显祖和沈懋学同往北京会试。这时的当朝宰相是张居正。张居正虽然是有明一代较有作为的政治家,执政时力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明王朝的衰亡,但他又是个刚而多欲的人,一手把持朝政,压制同僚,不忘营一

己之私。他为了使自己的儿子堂而皇之地金榜题名,让他们去结交享有盛名的汤显祖和沈懋学。汤显祖素来鄙弃以结纳权势而博取功名的行径,所以这个在一般举子看来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他却“谢弗往”(《明史·汤显祖传》)。而沈懋学则背着汤显祖去了张府。在此前一年,汤显祖客居安徽宣城时,就拒绝过张居正想介绍儿子与他交往的要求。张居正数次遭拒,其恼怒是可想而知的,结果会试揭榜,沈懋学与张居正次子嗣修一同及第,而汤显祖又落第了。汤显祖这时才开始认识到科场的腐败,他十分愤慨道:“谁道叶公能好龙?真龙下时惊叶公。谁道孙阳能相马?遗风灭没无知者……贱子今年二十八,把剑似君君不察。君不察时可奈何?归餐云实荫松萝……”(《荆荆州张孝廉》)他又作《广意赋》以自解,赋中云:“惟人生而历兹兮,特俯倡乎至人……余梦乎海若之陈珍兮,指为号而几真。”此赋虽曰广意,但调如《离骚》,意终未悛。

这以后的几年里,汤显祖与友人吴拾芝、曾粤祥等合作,据唐人小说《霍小玉传》写成《紫箫记》传奇,但因剧中有讥刺时事处,遂致“是非蜂起,讹言四方”(汤显祖《紫钗记题词》),全剧没有写完就搁笔了。此剧在艺术上并不成熟,汤显祖后来自己也谓之有“秣长之累”(见《玉合记题词》),但这次创作,对汤显祖后来的戏剧事业不失为有意义的尝试。这一时期,汤显祖还把自己的诗文集《问棘邮

草》寄给徐渭(字文长),请其评论。徐渭是当时文坛上敢与后七子抗衡的人物,自负才高一世,但看了汤显祖的《问棘卮草》,十分称赞,题诗一首有云:“执鞭今始慰生平。”(《读问棘堂诗集》)并把自己的诗集赠给汤显祖,引为知己。徐渭大汤显祖二十九岁,他是汤显祖之前明代最杰出的文学家和戏剧家。他二人间的文字之交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万历八年(1580),汤显祖第四次赴京会试,张居正三子懋修又来结纳,以鼎甲相许,而汤显祖照例婉拒,表示“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会试结果,张居正三子懋修为状元,长子敬修同榜考中进士,汤显祖又名落孙山。十年之间,四度落第,这对秉性真率、伉壮不阿的汤显祖实在是不小的打击。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某少有伉壮不阿之气,为秀才业所消,复为屡上春官所消。”(《答余中丞》)“数不第,展转顿挫,气力已减。”(《与陆景邶》)他苦闷,“把剑似君君不察”,不知前途何在。他为自己“五十之年,仆过其半”(《寄司明府序》)而焦虑,痛苦间游仙之思也在他脑中一度闪过:“忽有跨鹤人,言是斗中真,授我《几光经》,教我升天行。”(《黄花坛上寄龙郡丞宗武大还一篇》)但他终究还是没有因挫折而消尽“真气”。好友帅机也在送别他的诗中安慰他:“器大苦难用,分乖适不华。绳墨中自谐,安能趋群邪……愿子葆贞素,终以栋王家。”(《赠临川汤义少》)

(二)任官时期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故,汤显祖的命运出现了转机。次年,他第五次入京应试,终于以第三甲第二百一十一名赐同进士出身。与他同科中进士的,有在张居正病故后入主朝政的张四维的儿子甲征和申时行的儿子用懋、用嘉。

汤显祖虽然实现了科举梦,但素本耿介磊落的他又因不肯依附张四维和申时行,被排斥于“馆选”之外,留待北京礼部观政。此间,他目睹了官场中的种种丑恶腐败,深感仕途艰辛,于是掩门自贞,被不满意者目为“不可近”的“狂奴”(邹元标《汤义谿尉朝阳序》)。

一年后观政期满,汤显祖自请任职南京,授南京太常寺博士,属七品。这是个掌管礼乐祭祀的闲职,所以,他经常闭门博览群书,每每夜深人静时还可以听到他琅琅的读书声。家人笑曰:“老博士何以书为?”他答道:“吾读书,不问博士与不博士也。”(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读书之外,他喜欢骑驴观赏南京名胜,雨花台、燕子矶、秦淮河、莫愁湖,所到处必吟诗作赋,每成佳篇,“都人士展相传诵,至令纸贵”(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有时他也去寺庙读经、讲经。他还经常和早期东林党的重要人物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等人交往。后来罗汝芳至南京,汤显祖又同他一起讲学于城西小寺,

从学者甚众。这期间，以文坛领袖自居的王世贞也在南京为官，他的胞弟王世懋任南京太常寺卿，是汤显祖的顶头上司。王世贞在文学上搞复古，鼓吹“文必西汉，诗必盛唐”（《明史·王世贞传》），一时间士多奔走其门下，求其抬举。汤显祖对文学创作自有主见，并不赞成王世贞的复古主张。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汤显祖和王氏兄弟关系很疏远。一次太常寺公宴，王世懋作诗抒怀，属下纷纷唱和，独汤显祖没有理睬。他还大胆将李攀龙、王世贞的诗文中的用事出处及增减汉史、唐诗字面处标出，以说明七子的诗文皆是拟古的赝品。有人将此事传与王世贞，王世贞很不满意地说：“随之，汤生标涂吾文，他日有涂汤生文者。”（汤显祖《答王澹生》）

汤显祖为人处世是一向不肯随人俯仰的，吏部郎中司汝霖曾任临川令，又是汤显祖的老师，他很称赏汤显祖的才华，劝他与朝内官员结好以谋求升任吏部主事，汤显祖回信婉辞道：“长安道上，大有其人，无假于仆，此直可为知者道也”；“人各有章，偃仰澹淡，历落隐映者，此亦鄙人之章也。”（《与司吏部》）话语中不乏几分洁身傲物之气。同乡刑部尚书舒化劝他多接近老成人，少与少壮而居下位的好言事者接触，汤显祖复信针锋相对，明确表示自己站在敢于抨击朝政的“少年郎吏”一边（见《答舒司寇》），政治态度很鲜明。像汤显祖这样身居闲职的人，如果对世态不闻不问倒也会过得

太平无事,但他偏“于世俗嗜好一切无所当”而“好谈天下事与天下贤人”(《刘大司成文集序》)。他关注江南连年水旱给百姓带来的疾苦,对不断出现的边患忧心忡忡,对那些擅权谋私的朝中诸臣更是不满。他在这时据《紫箫记》重新改写成的《紫钗记》传奇,就有明显的批判腐败政治的倾向,剧中的卢太尉“坐掌朝枢”,权倾海内,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个形象身上,显然有宰相张居正、申时行等人的影子。

万历十六年(1588),汤显祖改官南京詹事府主簿。次年,迁南京礼部祭司主事,属六品。又一年(1590),他在好友邹元标家首次和达观(紫柏)禅师相会,这次相会对汤显祖的思想有着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受到李贽的思想的影响。达观和李贽是当时思想界极有影响的人物,人称“二大教主”。汤显祖对达观仰慕已久,而达观早在二十年前就看过汤显祖的诗,所以二人一见如故。达观替他取佛名“寸虚”,欲劝其出家,未成,从此他们成为终生不渝的挚友。汤显祖后来反复强调的“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寄达观》)的著名命题,即得自于达观。李贽是明后期进步思潮的代表,万历十八年(1590),他的《焚书》始刊于湖北,汤显祖得知后马上致书苏州知府石崑玉说:“有李百泉(贽)先生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求其书寄我诒荡否?”(《寄石楚阳荆州》)达观和李贽的学说表现出对腐败政治和程朱理学及虚伪礼

侍主湯顯祖頓首拜

伯父也來是與父思以和為生辨經仁貴道
人知命——周君書銘是往來也
吳中解之也來渴 吳太守是具里威也
附長表積多之藏集自能也之致之
頃見台弟併
兄二賢從者吳會元憲稿一書而初也

湯显祖手迹

教的猛烈批判的精神，这使汤显祖极为快慰，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见以可上人（达观）之雄，听以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答管东溪》）他从二人的思想中受到影响，受到鼓舞，他要用这锋利的“美剑”除恶驱邪，实现政治理想。

万历十九年（1591）闰三月，天空出现彗星，被视为不祥之兆，言官借此向神宗进谏，不料神宗反怪罪科道诸官“无一喙之忠”，只知“长奸酿乱”，“旁观避祸”（《明实录》），于是将六科十三道官员各罚俸一年。汤显祖见到这道谕旨，立即上《论辅臣科臣疏》，认为“非必六科十三道尽然”，只是“一二都给事等，有势力小人，相与颠倒煽弄其间耳”，不应不分辨是非曲直的“合科道尽行切责罚俸”。接着他把矛头直指当朝权贵，揭露了首相申时行与属下把持朝政、结党营私、打击异己、阻塞言路的种种恶行，一针见血指出：“皇上威福之柄，潜为申时行所移”，“陛下经营天下二十年于兹矣。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他希望神宗下谕重责申时行悔过，罢斥与申时行狼狈为奸、扰乱朝纲的吏、礼二科都给事杨文举、胡汝宁之流，“以新时政”。主昏则臣佞。此疏实际上也间接批评了神宗的昏聩不明，成为抨击腐败朝政的檄文，因此，奏书一出，震惊朝野。神宗阅疏后大怒，汤显祖被下诏切责。神宗指斥“汤显祖以南部为散局，不遂己志，敢假国事，攻击元

辅”，同时慰谕申时行“不必以浮言介意，卿等俱安心供职”（《明实录》）。汤显祖最终受到了远谪地处海南瘴疠之地的广东徐闻县（今广东省徐闻县）当典史的处罚。神宗如此忠奸不辨，黑白颠倒，使汤显祖进一步认识了朝政的腐败和仕途的险恶，所以当朋友们为他的遭遇不平或担心时，他却“夷然不屑”，曰：“吾生平梦浮丘、罗浮、擎雷、大蓬、葛洪母井、马伏波铜柱而不可得，得假一尉，了此夙愿，何必减陆贾使南粤哉！”（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又说：“去岭南，如在金陵，清虚可以杀人，瘴疠可以活人，此中杀活之机，与界局何与邪！”（《寄帅惟审膳部》）面对打击，泰然处之，刚傲如初。当然，他的内心也不无悲愤抑郁之情。在离开南京过杭州时，他遇到了好友姜奇方（字守冲），姜数年前已因触怒权臣遭贬，共同的遭遇，使汤显祖“凄然成韵”云：“旅客如吴会，同人在水阳……共梦常千里，相思偶一方，尚持心胆素，稀觉鬓颜苍。道旧才难尽，看新意易伤……魂来多白岳，人去独沧浪。”（《谪尉过钱塘得姜守冲宴方太守诗，凄然成韵》）后来他又有诗道：“伤心不问梁国老，白首湘江逐汉臣。”（《侍宸殿赠益藩老内史》）

万历十九年初夏，汤显祖离开南京，取道皖南返里，好友沈瓚作诗送别云：“天子拊髀思备边，诏许文武皆推贤。君才故是筹边者，阃外谁授专征权。一朝上书触禁忌，谪向边城为小吏……直到无忧行路难，古来虚语徒相宽。羊肠在前翻比馭，

烈士悲心敢安……”安慰之中也流露了几分不平。九月初，汤显祖由临川出发，经吉安、赣州，过大庾岭，入岭南；然后，绕道游罗浮山，经香山、澳门、恩平到阳江，最后折回徐闻。在这次旅程中，他游览了不少名胜，接触了民间和一些新事物，写下了许多瑰丽诗文。次年在肇庆，他还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眼界大为开拓。他日后在《牡丹亭》中有关岭南风土民情的描绘，皆得之于此番经历。

汤显祖在徐闻当典史，职位排在县令、县丞、主簿之后，司职刑政，但他最热心干的却是办教育，重建了贵生书院，并作《贵生书院说》。他所谓“贵生”，一是劝人勿轻生，二是教人知礼义。他在文中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希望当权者“能为天地大生、广生”。这是继承古代儒家民本思想而来的一种人道主义。他亲自登堂讲学，“日日津津不厌，诸弟子执经问难靡虚日，户履常满，至廨舍隘不能容”（刘应秋《徐闻县贵生书院记》）。他的讲学深入人心，极受欢迎，致使“延引士类，海之南北从游者甚众”（《徐闻县志》）。

万历二十一年（1593），四十四岁的汤显祖量移浙江遂昌知县。遂昌地处浙江中部群山之中，地寡民稀，“学舍、仓庾、城垣等俱废”（汤显祖《答王伯臯》），最称贫僻，但对有着政治抱负的汤显祖来说，这是他实现政治理想的一个舞台。他在遂昌为政五年，“一时循吏声，为两浙冠”（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政绩主要是：

其一,重视生产。他在春耕时,亲自备下花酒率百姓举行劝农仪式,规劝大家尽心从事农耕,他曾作诗说:“家家官里给春鞭,要尔鞭牛学耕田。盛与花枝备留赏,迎头喜胜在新年。”他后来在《牡丹亭》中所写杜太守下乡劝农的一出戏(第八出《劝农》),实际上有作者在遂昌劝农的影子。

其二,整肃治安。遂昌多盗,一些豪门无赖子弟与盗匪勾结,抢掠民财,此外虎患也很严重。汤显祖到任后,搜捕盗贼,“勒杀盗酋十数人”(《遂昌新作土城碑》);同时亲自领兵进山猎虎,不久除了虎患,使百姓有了安宁的生存环境。

其三,施政以仁。他废除苛法重刑,使政简讼清。他说“斗大平昌(即遂昌),一以清净理之”(《答李舜若观察》)。他在遂昌的五年中,县无斗伤笞系而死者,他曾在除夕遣放囚犯回家过年,元宵让囚犯观灯,有病者贷以药。其人道思想,卓然可见。

其四,抑制豪强。汤显祖为官刚直不阿,遂昌名宦项应祥时为京城吏部官拜都给事,其家子弟仗势拒交赋税,汤显祖查明后即写了《复项谏议征赋书》给项应祥,督促他上缴所欠赋税。遂昌民间至今还流传着汤显祖处死项应祥一个横行乡里的儿子的故事。明沈德符《野获编》记载:“汤为前吏科都给事东鳌(应祥)所切齿,项故遂昌乡绅,时正听补入京,故祸不可解。”虽然沈德符未言明汤项交恶的原因,但人们多认为与汤惩治项的儿子一事有关联。汤显祖还严厉惩处了与盗匪相勾结的